

新
民
說

余英時文集

第一卷

史學、史家與時代

上海師範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余英时文集

第一卷

史學、史家與時代

余英时 著
沈志佳 编

Shixue Shijia yu Shida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责任编辑：蒋晓玉 李 琳 陈艾利

封面设计：刘 凇

版式设计：陆润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史家与时代 / 余英时著；沈志佳编. —2 版.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余英时文集：1）
ISBN 978-7-5495-5418-8

I. ①史… II. ①余…②沈… III. ①史学—中国—
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780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4.625 字数：37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2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4 000 册 定价：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余英时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即将面世,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友人沈志佳博士通力合作的最新成果,让我首先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但是我必须赶紧补充一句,对于志佳而言,这“感谢”二字是绝对不够用的。像前十卷一样,从集结到编定,她为这两卷文集做了无数劳心而又劳力的细致工作,她在《编者后记》中已透露此中消息。

最使我感动不安的,志佳自己的职务一向很繁重,接掌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务以后,更是如此。但是十几年来,她竟在繁忙的专业之外,硬挤出时间来,先后为我编出了十二册文集。由于志佳和我是史学界的同行,她编我的文集无论是主题的选择、分类,或系年等方面,都井然有序。因此我的作品才能够以系统性的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得到这样一位富于“理解之同情”的编者,我当然感到十分欣幸,但每一念及她的辛苦和牺牲,则又不胜其惶悚。

《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的重点各有不同,《编者后记》已予指出,这里不必重复。这部文集的最早四卷是2004年出版的,十卷本(第五至第十卷)则是2006年出版的,距今已整整七年。现在第十一、十二卷的刊行可以说是承先启后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此中原因并不难寻找:志佳

一直在收集我最近七年来的新作；她将这些新作和以前未收但性质相近的旧作聚拢在一起，新的文集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志佳告诉我：她对于第十二卷以下已有初步构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拭目以待。

这部文集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论题繁多，初看似有泛滥无归之势。因此我想简单地概括一下我的治学宗旨，以供新一代读者参考。

上接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议，我采取了下面的假定：我承认人类文化大同小异。因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通，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可以相通。但因为“小异”，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复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则特色也越显著，目前讨论得很热烈的古代“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s)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史例。在这一假定之下，我的历史研究自始即以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为最后归宿。由于文化特色无所不在，不是仅从思想或哲学一端所能掌握得住，因此我在思想之外，还要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去查看这一特色是如何体现的。但我并不把各部门完全分开讨论，而是从整体的(holistic)观点查其互相之间的关联与会通，因为文化特色往往在此关联与会通之处显现。

又由于文化特色并非一成不变之物，而必然在历史流程中逐步演变，因此我的研究也不能限于任何一个时代。大体上说，我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

上面提到，我对于中国文化特色的探求直接导源于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论。这就是说，如多数现代的中国学人一样，我的文化关怀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我深信文化之“大同”，因此对五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两大普世价值始终抱着坦然接受的态度，至今未变。但是对于很多五四知识人一方面将“科学”推至“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极

端,另一方面又将清末以来“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邓实[1877—1951]语)的态度发展到顶峰,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所以追溯到最后,我试图在传统的方方面面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色,除了历史求真之外,同时也希望脱出上述两种偏颇,而寻求一条比较顺适的中西文化会通之道。

相应与这一文化关怀,我的阅读和思考范围往往不能不越出我的教研专业,即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了突出中国的文化特色,我有时也必须引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因为文化特色只有在互相比拟中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为了展示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所经历的种种危机,我甚至不能不把我的史学研究扩展到20世纪。

以上概括只是提醒读者,我的文集虽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一气呵成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预设(assumptions)、中心观念和价值关怀,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机地联系起来,包括第十一、十二两卷的文字在内。有心的读者试一披寻,当可自得之。

余英时

2013年10月27日于普林斯顿

原
序
一

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费心费力编成的。她近几年来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论著，分门别类，重新编排。这里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印行这四卷《文集》，先后也很费周章。我必须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 世纪 50 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可见这是一切治学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这两句诗来自解了。

1901 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在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很明显的，通过当时日本史学界关于“东洋史”的研究，他已接

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欧洲史的分期模式。梁氏这篇论文是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学》一文同样重要。就他所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基本概念而言,他确实拓宽了中国史研究的眼界,其贡献是很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而言,他却在无意中把“西方中心论”带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欧洲史分期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使许多中国新史家都相信西方史的发展形态具有普世的意义。以西方史为典型,中国史直到清末都未脱出“中古史时代”,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便明白承认:“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见第二编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期的绝对准则。现代中、西之异主要是两个文明体系之异,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中古”与“近代”之别。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化(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但是我十分不赞成“削足适履”式的比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史的全面歪曲。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变作一种历史通则,应用于俄国史的研究上面。这一强烈抗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学论著,虽然写作的时间有迟有早,大体上都是从上述的立场出发的。我诚恳地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余英时

2004年3月21日

原序二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 2004 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博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史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

中国史的专业,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余英时

2006年元旦

目 录

第一卷 史学、史家与时代

- 1 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 70 广乖离论
——国史上分裂时期的家族关系
- 84 说鸿门宴的座次
- 94 史学、史家与时代
——新亚书院研究所、新亚书院文学院联合举办中国
文化讲座第二讲记录(1973年12月2日)
- 116 从史学看传统
——《史学与传统》序言
- 129 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
——1973年11月在新亚书院“中国文化学会”的讲演
- 142 《历史与思想》自序

- 154 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
——介绍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
- 175 章实斋与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
——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 226 《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编绪说
- 400 《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
——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序
- 424 《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 453 编者后记/ 沈志佳

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一) 引言

东汉初期帝王如光武、明帝、章帝等都比较尊重士人，这是大家所习知的。而且光武本人也是士人出身，曾于“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所以虽在东西诛战之际，犹能“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樊准语）。赵翼《廿二史札记》论“东汉功臣多近儒”条云：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於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赵氏看出了两汉开国君臣的性质不同，确是他的史识过人之处。然而他把这一重要事实单纯地解释为“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与“性情嗜好之相近”，而不能从历史的与社会的背景上看问题，却未免知其

一不知其二了。我们根据赵氏这一段文字所启示的线索,而将两汉政权建立时社会背景的主要差异,加以比较研究,便可对东汉政权的本质,及西汉末叶至东汉初期这一阶段的政治史,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与贯通性的解释。并因而了解到,在赵氏所指出的两汉开国君臣性质不同的背后,还埋藏着一些可以说明两汉社会变迁的重要事实。

(二)士人数量的激增

秦汉之际,一方面士人数量极少,另一方面汉高祖又复“慢而侮人”(王陵语),甚至解儒生冠而溲溺其中(《史记·酈食其传》),在这种情势下,当时的士人,于政权之建立,自然鲜能为力。但是在西汉末叶,形势却不同了。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士人数量的激增,《汉书·儒林传》序记载自从武帝时“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以后,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颜师古注曰:常员之外更开此路)。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又据《前汉纪》卷三十载,平帝元始四年,王莽“为学者筑舍万区^[1],所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有才能及小学异艺之士,前后至者数千人”。这些还只说明了太学生名额的增长,至于郡国方面,自文翁在

蜀郡开设学校后，至武帝时，遂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汉书·平帝纪》）。是学校之设立几已遍及乡壤之间（参看《西汉会要》卷二十五）。

此外如私人教授也已颇发达，我们且列举几条史实于下：

1. 吴章 “治尚书经为博士……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汉书·云敞传》）既云“教授尤盛”，则可见当时私人授徒之风已很普遍，固不止吴章一家了。

2. 疏广 “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同书《疏广传》）

3. 赣遂 “耆老大儒，教授数百人。”（同书《朱博传》）

4. 翟宣 “宣教授，诸生满堂。”（同书《翟方进传》）

5. 眭孟 “严彭祖……与颜安乐俱事眭孟。孟弟子百余人。……孟死，彭祖、安乐各颺门教授。”（同书《儒林列传》）

6. 王良 “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称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后汉书·王良传》）

7. 刘昆 “少习容礼，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同书《儒林列传》）

8. 夏恭 “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同书《文苑列传》）按恭亦王莽时人。

9. 刘茂 “长能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王莽篡位，茂弃官，避世弘农山中教授。”（同书《独行列传》）

10. 索卢放 “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同上）按放亦王莽时人。

11. 伏湛 “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更始立，以为平原太守。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同书《伏湛传》）

12. 徐子盛 “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同书《承宫传》)按徐子盛为西汉末人。

从历史记载上我们可以看出,私人教授的风气愈往后愈普遍。所以班固的《儒林传》赞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三)士族的形成探源

可是我们不能把这种人数的增多单纯地理解为力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士人的社会身份已随着这种增加而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西汉政权之建立,士人虽未发挥重要的作用,但高祖阵营中还是有少数儒生如酈食其、陆贾、叔孙通等。这些人的社会本质如何呢?稍一回想便可知道:他们还是和战国时单身的“游士”没有什么分别;他们除了知识之外,别无其他的社会凭借。叔孙通虽带了一百多个学生,在天下未定之前,却一直被冷落在一边。但在西汉末叶,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然则,士与宗族又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呢?这一问题,若详加分析,必须另有专文。我们在此只能略加探溯,以明源流所自而已。家族群居之制源自远古,本非汉代的新产物。秦与汉初的移徙大族政策,一部分用意便在于防止封建宗族势力的复活^[2]。武帝时更有强宗大姓不得族居的禁律。《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说:

其(郑弘)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又《北堂书钞》四〇、七八引)

可见传统的宗族势力一直很强大,而为西汉统治阶层所畏惧。然而这种宗族势力与士人之间并未发生具有社会含义的联系,故其性质应与后来的“士族”有别,未可混为一谈。我们试举一例以说明之。《史记·主父偃列传》记偃之言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后偃拜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又见《汉书》本传)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武帝之世,士与宗族还没有完全打成一片。从此一故事与苏秦的传说之相似性来看,可见那时的士人仍未脱离“游士”阶段。此外如流传颇广的朱买臣的故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其所以如此者,最根本的原因,显然是由于那时的士尚未能普遍地、确定地取得政治地位,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他们的宗族。但在武帝崇儒政策推行之后,士人的宗族便逐渐发展。如《史记·酷吏列传》记张汤“于故人士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及汤死,“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汉书·张汤传》同)。自此以后,士与宗族的关系便日深一日。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汉书》本传)。朱邑“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同书《循吏传》,又见《前汉纪》卷十九)。疏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同书本传,又略见